

【文学】

DOI: 10.15986/j.1008-7192.2017.06.013

戏台边上的悲喜人生

——论陈彦《装台》的底层书写

徐翔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710125)

摘要: 伴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 底层又一次进入大众视野。与此同时, “底层书写”也成为文坛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 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剧作家陈彦的新作《装台》以西京城一群装台人为主角, 为我们展示了城市中底层小人物的悲喜人生。作者以他多年深入生活观察入微的笔触, 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密布着苦痛、冲突、荒谬但又温情的故事, 写出了底层平民的悲欢离合, 展示了西京古城的另一片风景, 同时也道出了世事人心。

关键词: 陈彦;《装台》;底层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6-0077-06

剧作家陈彦继《西京故事》之后推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力作《装台》, 小说讲述了一群装台人的人生际遇。装台这个行当是游离于七十二行之外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陌生的。在戏剧世界里, 一场戏的上演是需要一个典型环境的, 装台人便是去布置这个典型环境, 由于总是隐于幕后, 这群沉默的大多数总是被人遗忘。然而陈彦对这群人却是再熟悉不过了, 浸淫文艺团体几十年的经历让他有种诉说的欲望, 要写一写这群戏台边上的人, 本隐身于帷幕背后的装台人在陈彦的笔下逐渐清晰起来并走入读者的视野。作者以他多年深入生活观察入微的笔触, 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密布着苦痛、冲突、荒谬但又温情的故事, 写出了底层平民的悲欢离合, 展示了西京古城的另一片风景, 同时也道出了世事人心。

中国文学创作一直有关注底层群体的传统, 无论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 还是鲁迅笔下麻木生活的庸众, 亦或是老舍笔下的车夫祥子, 这些底层群体都被镌刻在文学史人物形象长廊里。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社会结构也在进行分化和重组, 庞大的底层

群体由此出现, 与之相应的底层文学也在近年来的文坛上形成有规模的文学潮流。关注底层, 重建文学与广袤的社会生活的联系, 对底层生命的人文关怀是这类作品的一贯追求,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匍匐在无言的黑暗之中”^{[1]46}, 文学有义务照亮这个被遮蔽的群体, 不论是何种形式的生命都需要诉说, 在这个意义上, 底层文学也就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装台》便是如此。小说聚焦在以刁顺子为首的这群装台人身上, 在戏剧世界里, 他们是活在最底层的一群, 卑微如蝼蚁, 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 戏台上的光鲜永远与他们无关, 在顺子看来, “装台人在唱戏这行当里, 连小厮、丫鬟的地位都不如”。他们卑微地活着, 面对环境的挤压只能逆来顺受, 以至于连作为人的尊严都缺失了, 然而尽管活得卑微, 他们的世界仍是一个有生命的世界, 在痛苦之外也有欢乐。小说以悲喜剧交融的话语方式揭示了这群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现实, 揭开了曾经被遮蔽的生活领域的面纱, 这群装台人的人生悲喜剧通过富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在另一个戏台上演了。

收稿日期: 2017-12-28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西当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书写”(2014J28); 西安培华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生态视野下的陕西地域文学研究”(PHKT16086)

作者简介: 徐翔(1981-), 女,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 37428864@qq.com

一、戏台边上的人生

《装台》所写的故事是戏剧世界的故事，一场戏好不好看，关键就在这场戏够不够精彩，能不能抓住人。小说里戏台上的世界足够精彩，可以称之为一场好戏，小说里贯穿剧情始终的那出剧目《人面桃花》便催人泪下、扣人心弦；与此同时，剧团里的那些各色人物，同情下苦人的翟团长，为了艺术歇斯底里的靳导，变态灯光师丁白，吝啬的剧务寇铁，亦或是为了争排名、争奖项的角儿，这些站在戏台上的人给读者奉献了一出精彩大戏。但小说还有“戏外戏”，这另一场戏的主角便是以刁顺子为首的装台人，这群处在艺术产业链最底层的下苦人上演的是自己的戏，在戏台边上的世界里，他们的故事论戏剧性毫不逊色于戏台上的世界，一样充满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原生态的生活被作者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他们的悲喜人生同样扣人心弦。

主人公顺子的人生就是一场精彩的戏，小说开头就设置了一个抓人的悬念，“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叨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如此艳福，读者可能会预料这是不是一个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人生呢，但故事就此开始反转了，顺子这个名字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他的人生一点都不顺，似乎一切底层人的不幸都被集中在他一身。婚姻的不幸，和女儿之间扭曲的父女关系，工作中的艰辛等等，这一切都让顺子陷入了一团乱麻中，家庭和事业就是顺子人生的两个舞台。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进入了刁顺子的世界，和他一起体味着这个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体验着他生活的艰辛和情感的失落，顺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极富质感的，让人惊叹。

同时，小说以刁顺子为中心，写到了他身边的那群装台工人，写到了他的家人，写到了他生活的城中村，写到了这些小人物生存的西京城，这是另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作者用从容淡定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画卷，向人们展现了生命的苦难与韧性，这些小人物虽然平凡卑微，但他们身上又闪烁着奇异且令人震撼的光彩，这束光穿透了故事和人物，照射出一幕

悲喜交融的人间舞台，写尽了人情世态，歌尽了悲欢离合。

二、物质贫困与精神痛楚

多数底层文学在凝视底层生活状态的时候，会将底层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低下的生活质量呈现出来，作品中常常会出现逼仄、破败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场景。底层作为边缘群体其生存是最没有保障的，小说充分挖掘了这群装台人所面对的生活困境。顺子这群装台人就是活在底层的边缘人，无论对西京城而言，还是唱戏这个行当而言，他们卑微得让人们甚至忽略了他们的存在，如果将城市和戏剧行当看成一条食物链，他们就活在食物链的最底端。他们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苦难，在异己的环境中艰难生存。

小说里这群装台人无不面对物质生活的困窘，他们干着最苦的活，却只能挣得少得可怜的工钱，他们总抱怨钱少，可还是浑身臭汗没日没夜地干，但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狼狈不堪，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被克扣拖欠工钱，为了能顺利拿到下苦钱，还得放下尊严阿谀奉承献殷勤。顺子作为一个城里人，有片瓦遮头，作为这群装台人的领袖，次次工钱可以多拿一点，但即便这样，他还是要面对物质的困窘。因为只会蹬三轮和装台，顺子挣不了大钱，尤其在第二任妻子赵兰香患病之后，家里更是捉襟见肘，顺子自己也不明白“干了几十年，日子也过不前去”。女儿菊花因为不满他和蔡素芬，经常向父亲要钱发泄自己的不满；花钱如流水的哥哥刁大军动辄就让顺子拿出三五万来，久而久之，顺子在花每一分钱时，都要计较半天，连自己患了严重的痔疮都不舍得花钱医治，每次花钱好似放血割肉般疼。因为物质的困窘，顺子只能过着千疮百孔、狼狈不堪的日子。不仅是顺子，他身边那群兄弟同样过着窘迫的日子，小说里写到三皮住的地下室，那是一个阴暗潮湿常年不见光弥漫着霉味的地方；大吊家里也是，进城打工的钱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想给患有残疾的女儿手术，可钱总也攒不够，为了生活，大吊在身体严重不适的情况下没命地干，以致于客死异乡。这就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他们从不曾想象过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每天灰头土脸地为

了生存而奔波劳碌，永远要为生计发愁，永远要为贫困所困，永远要省吃俭用，永远要为花每一分钱思虑半天。他们就如同小说里搬家的蚂蚁一样，扛着远远超出自己负荷的生命之重。

在窘迫的物质生活的挤压下，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长期的逆来顺受，使他们无法有尊严地活着。顺子活得窝囊，顺子的卑微使他在面对异己的世界时总是无能为力，他的尊严只能被无情地践踏，在他身上似乎出现了某种“身份的焦虑”。身份是个体或族群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标志，“像灵魂或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最终会有不同的可能发展，但在人的一生中基本保持不变，由此生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2]196}。这种位置和标志能够让个体或族群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一旦身份出现了不确定便也意味着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也无法获得周围的认同。“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知觉”^{[3]50}。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无论顺子处在何种社会关系中，他的身份似乎总是缺失的。顺子是城市人，但他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在其他村民靠房租、占地款过着悠闲日子的时候，他还在从事着蹬三轮装台这下苦的行当，“身为西京这么个大都会的老门户，却蹬了三轮，给人家唱戏的拾了鞋带，混得还不如一些进城的农民工，自然就不被村里人待见了。”在家里，作为父亲的顺子却毫无父亲的尊严，也无法获得家人的认同。在女儿菊花眼里，顺子“一幅奴才相”，“让她在村里，活得连头都抬不起”；在养女韩梅眼里，“继父的腰板，一直就没挺直过”；甚至在妻子蔡素芬眼里，顺子也是“还没打，他就倒，还没骂，他就磕头如捣蒜”；连顺子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自己最下苦但活得最下作。年关前这个家解体前的那一幕最让人心惊，面对菊花和韩梅的生死相搏，顺子跪下了，“这么多年来，他就是用自己的低下，可怜，甚至装孙子，化解了很多矛盾”，可正是这种低下，养女韩梅和妻子蔡素芬对他彻底失望，两人都离开了，这个家还是解体了。

最意味的是，顺子终于摆脱低下，获得尊重的那一刻却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一只狗，这一幕也是小说里最绝妙的一场戏。他临时客串

《人面桃花》中狗的角色，演得那么生动自如，获得了那么多的掌声，“这一生，只有被人贱看、呵斥的份儿，从来没有如此高尚、重要、尊严地活过一天。他在充分享受这种高尚，这种重要，这种尊严。”这个卑微的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尊严时候得意轻狂起来，一条本应该死去的狗却动了起来，他演砸了，被所有人唾弃，得来不易的尊严转眼间又成了低下。这个富有喜剧色彩的场景让读者发笑的同时却又为顺子感到可悲，甚至有了一丝荒诞的意味，顺子始终无法与周围的环境达成一种和谐，他就在这种不和谐和错位的身份中过了几十年。“荒诞存在于人，也同样存在于世界”^{[4]26}。顺子总是处在这样一种荒诞的境地：一方面，他拼命下苦挣钱，渴望获得周围人和家人的认同；另一方面，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变本加厉。小说真实地刻画了顺子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物质的困窘、情感的失落、亲情的抛弃，展现了底层小人物生存的沉重和精神世界的荒芜。

三、 深层的人性发掘

小说写了顺子这群装台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当下中国贫富分化、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和对立性等问题。但底层文学如果只是揭露苦难和不幸，走“苦大仇深”的路子，在“苦情戏”上做文章，就会沦为苦难素材的堆积。底层之所以苦难，除了财富分配不公等外在因素外，底层自身是否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小说通过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次思考。

真正有深度的作品，总会执着于对人性的书写，也许取材会局限于一时一地，但其内涵必定是对普遍人性的描写。底层书写会以最贴近民间的质感来把握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维度，在对人性的深层发掘中凝聚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小说深入到了每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打开了人性这座复杂的迷宫，人性的善与恶毫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顺子、菊花父女，还是身上带着缺点恶习的墩子、三皮等人，这群卑微的小人物在作者笔下变得立体复杂起来。

顺子活得窝囊，他总是在“热脸煨人家的冷屁股”；他会献殷勤，甚至熟练掌握了一套拍马奉

承、阿谀逢迎的辞令,每次装台总会不由自主地要到领导面前表功;他面对女儿菊花总是委曲求全毫无原则,逼得韩梅和蔡素芬无奈离开。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反抗的资本,他的队伍几乎垄断了西京城的装台行业,他又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本来是具有充分的反抗资本的,可他却主动选择了低三下四。他的低下和逆来顺受,他阿Q式的自轻自贱,他骨子里的奴性总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这让人看到顺子人性中的某些因子原来是一个古老的存在。顺子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并且进入了城市,可他的精神世界和历史的进步相比永远慢了半拍,仿佛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反抗意识在顺子的世界里似乎永远是缺席的。百年前那些匍匐在中国大地上挣扎求生的农民的魂灵依然活在顺子的精神世界里,国民的某些劣根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依然存活在当下。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的处境是无法反抗,那么顺子则是主动放弃了反抗,他走不出自己的卑微,因为他被环境、责任、血缘亲情所绑架。他不能委屈了自己那些下苦的弟兄,所以只能委曲求全,只求工钱不会被克扣;他不能抛弃菊花和韩梅,所以只能放弃父亲的尊严,只求家庭不要解体。当他终于决定不再装台,要过退休干部的生活时,面对大吊的恳求,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他年年都给小学老师拜年,聆听教诲,在老师去世后,婉拒了老师本打算给他的遗产,顺子人性中的奴性、卑微、低下也是和善良、责任、高尚共存的。

小说里顺子的女儿菊花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角色,这又一次印证了人性是复杂的这个永恒的命题,读者甚至会好奇为什么这两个性格极端反差的人居然是父女。菊花充分让人感受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她的肉体里面仿佛住着一个罪恶的灵魂,她暴戾、凶狠、冷血,她的人生哲学就是“他人即地狱”,她残忍地对待身边每一个她看不顺眼的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她瞧不起父亲,觉得父亲蹬三轮装台让别人看低了自己,动不动就是咒骂;她用最恶毒的语言去凌辱对自己心存善意的继母和共同生活多年的妹妹;她残忍地虐杀了断腿狗好了,其手段之血腥令人发指。面对疯狂的菊花,顺子两次下跪却不能改变她分毫,这个角色让人感到可惧又可憎。但菊花又不能让

人彻底地恨,随着对菊花过往的描述,人们看到了冷酷的菊花曾经有过的温柔和善意,她以前也是体贴过父亲的辛苦的,她曾经和韩梅也是和睦相处的,她性格扭曲的原因也渐渐浮出水面。幼年时母亲和人跑了,父亲又忙于装台无法照看她,身边的小伙伴们也瞧不起她,亲情和友情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是缺失的。由于貌丑,她成了大龄剩女,情感经历几乎是空白,唯一一次和异性的接触也是在晚上借着模糊的灯光遮掩了真容,以至于小伙在见到菊花真容时就销声匿迹了。情感世界的空虚和性的压抑越发扭曲了她的性格,她求之不得的对别人而言反而轻而易举,父亲一个接一个娶老婆,妹妹韩梅也有男朋友,连唯一的闺蜜乌格格也嫁了一个“高大上”。受到刺激的菊花把她内心的怨对准了这些人,一次次歇斯底里地制造战争,仿佛只有折磨人的快感才能慰藉她寂寞的灵魂。然而在菊花癫狂的时候偶尔也闪现出以往的温柔,在得知可以和刁大军去澳门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对父亲和妹妹和善起来,在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谭道贵之后也开始孝敬父亲了,原来她也是一个好女儿,只是过往的一切遮蔽了她的本心。作者并没有试图为菊花恶毒的行为开脱,他只是让人看到了这个可恨女人可怜的一面,在拷问人性恶的同时也在拷问人性中的善。

对复杂人性的揭示贯穿了小说里的多个人物,这些小人物都是世俗的,有着种种小人物的缺点和陋习。墩子由于性饥渴,对着寺庙的佛像自慰,亵渎了佛门圣地后因为怕担责任一走了之,留下顺子代替他挨打受骂,这个有点龌龊的人却也会在演出时主动领掌,只为让自己弟兄装的台多一点掌声;三皮一直苦苦纠缠蔡素芬,差点让顺子戴了绿帽子,但也会在猴子、顺子住院时候尽心照顾;神经质的靳导会在舞台达不到要求时骂得顺子无地自容,却也真心体恤这些下苦人。这些人都有缺点和恶习,但他们的人性中同时也有着闪光点,小说对人性的挖掘让人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也体会了人生的百种滋味。

四、缝隙中闪烁的生存希望

底层面对苦难该如何自我救赎?他们是在苦难中沉沦亦或实现自救?顺子这群小人物有自己

的选择。小说在描写底层人困窘的生活同时，也不忘给阴郁的底层生活投射些许的阳光；在冷酷和丑恶面前，也不忘送上一丝暖意。面对顺子的卑微低下和他所承受的生命之重，作者虽然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情绪，但也让人看到了希望和温馨。小说中以顺子为首的这群装台人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也不会轻易向生活妥协，更不允许自己堕落；他们也有不甘、埋怨，也会发牢骚，也会诅咒那些无良的雇主，但也会让这一切很快烟消云散。他们一五一十地活着，甚至是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着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接近生存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甚至比一般人更能参透生活的真谛。

这些装台人总是不停奔波在一个接一个的装台现场，下最大的苦，却要受最大的气，但他们仍然在与苦难对抗的过程中坚守着自己的位置，以坚韧的姿态承担着生存的重压，有某种东西支撑着他们在困苦中前行，这就是生存的信念。这信念支撑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谋生，坚持装台这种谋生方式，同时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们身处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但个体对生存的执着又促使他们不断前行，生存的压力和动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卑微的生存就又显得崇高而伟大。就像顺子，命运对他极尽苛刻，总是在给他希望的同时又把希望毁灭，命运数次让他在困境中无法突围，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生存的信念，“这里有一个，他叫刁顺子，这个人竟然不听招呼不听安排，他竟然在一次次理当被世界碾成纸片的时候，一次次晃悠悠又站了起来，他这不仅是挺住，简直是要跟这世界没完没了了”^[5]。这就是顺子，看似柔弱，内心却又无比强大，总能在绝望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希望，顺子仿佛一个圣徒一样，在人世的道路上艰难修行，他不仅要活着，而且要好好地活着，就如同小说里那蚁群一样“托举着比自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在有条不紊地行进着”，“它们行进得很自尊、很装严，尤其是很坚定”。

为了更好地活着，顺子认认真真劳动、踏踏实实做人，因为生存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这就是顺子的人生哲学，这信念扎根在他内心深处，任狂风也不能吹灭。世上大多数人都愿接受命运的安排，总想摆脱自己的宿命，但

顺子就在命运给他划定的路线上认真前行，一丝不苟，既然装台是他不能摆脱的宿命，那么他就认真得做一个最好的装台人。

小说里，顺子一行人随秦腔团到北京参加会演，这次的装台是他一辈子最难的一次，看似不可解决的问题到了顺子这里却都迎刃而解，正式表演时候，顺子如同一个艺术家一样有条不紊地送景、打追光，如果没有顺子也就没有这场完美无缺的演出。不仅是顺子，小说里每个装台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逻辑和价值坚守，正如作者所认为的“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 with 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6]433}。在作者看来，这庄严的行进姿态也是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恒常的价值观，它没有因为时代变化而失色，反而在小说里不断散发出耀眼的光华，让人看到了一种真实并且神圣的生命存在形态。这些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卑微却又庄严地行走于人世，透过他们，人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本真，困境与挣扎中的韧性以及简单质朴的生活中流露出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命存在形态会让人产生对生命的最真实的感悟与体验。

小说《装台》中，陈彦始终坚持自己的底层立场，沉入到生活最深处，描写了一群装台人困苦而庄严的生存图景。他们的生存困境和他们的心灵世界，他们面对生活压力的无奈以及执着前行的勇气和尊严，困惑与希望，挣扎与理想，卑微与高尚，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这些平淡生命背后的庄严与伟大。透过小说，我们看到底层世界不再仅仅是贫困和卑微，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期盼和对人生价值的确认。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 五种形象[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2] J·拉雷恩.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 戴从容,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 方文, 王铭铭,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4] 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 杜小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5] 李敬泽. 在人间[N]. 人民日报, 2015-10-15(8).

[6] 陈彦. 装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Life at Side of the Stage

——On the bottom writing of Chen Yan's *Setting the Stage*

XU Xiang

(Culture Institute,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710125,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low social strata have entered the public view ag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bottom writing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many excellent works have emerged. *Setting the Stage*, written by the playwright Chenyan with those setting the stage as the protagonist, shows u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life of those little guys living at the bottom of Xijing city. Deep into life and sharp-eyed in writing style the writer tells a story full of tender and pain, conflict, and absurdity, though. He writes out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of the underlying civilians, presents another piece of landscape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unfolds the affairs and feelings of people.

Key words: Chen Yan; *Setting the Stage*; bottom writing

【编辑 吴晓利】

=====

(上接第70页)

An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istic Care Desig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Three-Bays-and-Two-Corridors” in Lingnan Region

LI Jian-qing, MIAO Jian-feng^{*}

(Dept. of National Defense Architectural Planning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ogist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living space about the layout form and space elements design in Lingnan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three-bays-and-two-corridors patter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umanistic care in design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humanistic care design is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the flexible space layout to meet the physiological needs of residents, the defensiv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compon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living safety, the multi-level and compound design of the living communication space to meet the needs of househol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wide variety of colors and shap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visual psychology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s. The design of humanistic care in the living space of Lingnan dwellings of three-bays-and-two-corridor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architects in shaping a pleasant living space, that is,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the functional diversity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intimacy.

Key words: three-bays-and-two-corridors; design of living space; living demand

【编辑 高婉炯】